

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学术成就

吴松伟 高德胜^①

摘 要：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取得的成功基于其学术底蕴。教材学术性的标准在于教材编写基于研究、教材体现理论自觉、教材对学术问题有所突破。本套教材以研究为基本编写方式，在伦理观、德育观、教材观和教学观上都有学术理论的指导。本套教材探明了儿童经验进教材的路径，厘清了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的关系，摸索出了在传统文化教育中体现儿童立场的方法，突破了一些学术难题。“内容至上”的倾向，“应试”化的教学氛围以及对“副科”的轻视，是发扬本套教材学术成就的主要挑战。弘扬教材的学术性，将教材的学术成就转化为实践进步，需要各方面教育主体的共同努力。

关键词：小学；《道德与法治》；统编三科教材；德育

作为学校教育的关键要素，教材是影响人数最多、对人影响最为深远的文本。教材建构着儿童当下的生活，更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教材的重要性决定了它必须有强大的学术性作支撑。“最浅之教科书法，必得最深其学者为之。”^②教材编写是一项专业化、精细化和高难度的工作，其中有不计其数的问题需要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来解决。^③学术性不仅是教材质量的根本保障，也是评价教材质量的重要尺度。

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 2017 年在全国投入使用后就不断受到广大教育实践者和研究者乃至国际同行的一致赞扬，为中国德育课程的发展和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本套教材的成功与其学术底蕴密不可分。本文通过揭示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学术成就，阐明弘扬教材学术性的路径及其挑战。

一、教材学术性的标准

探讨教材的学术成就，需要先理解教材学术性的标准。古汉语中“学”“术”分用，分别指“学理”和“方法”。现代汉语的“学术”（academic）概念源自西方，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④英文 academic 和 academy 两个词源于拉丁文“academia”^⑤。

^①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根本问题的理论反思”（22JJD880025）。作者简介：吴松伟，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62）；高德胜，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62）。

^② 严复. 论小学教科书亟宜审定[J]. 东方杂志, 1906（6）：105-109.

^③ 石鸥. 教科书概论[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9：104.

^④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第7版）[DB/OL]. （2021-05-17）[2023-01-14].
<https://www.cihai.com.cn/yucai/detail?docLibId=1107&docId=5742142&q=>

^⑤ 英文中“academic”和“academy”源于拉丁文“academia”，而“academia”则源于雅典的地名“Akademeia”。柏拉图在此建立学院讲学，且尤为注重思辨的理论智慧，从而使“academia”在后世成为学术和学术机构的代名词，获得了“知识的积累”的引申义。吴式颖，任钟印. 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第

“academic”一词有“学院的、大学的”“重理论的”“非实用的”等含义^{①②}，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是指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在专门条件下进行的非实用性的探索和创新。^③但中小学教材，并非服务于纯粹学问的传承与创新，而是服务于儿童教育的实践。这一点在德育教材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假如学术性使德育教材成为传递学术知识的工具，德育就会变成培养“道德研究者”的教育，这样的“学术性”不值得追求。因此，不同于专著和论文，教材的学术性不追求概念和理论体系的系统性、深刻性，而必须自有其独特的标准。教材的学术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教材编写基于研究

教材学术性的第一个标准在于教材的编写以研究为基础。编写人员的研究积累是教材编写基于研究的显著表现。历史上经典教材的编写人员往往是本领域的学术大家，教材编写人员必须对本学科有深入把握。例如，民国历史教材的编者吕思勉和顾颉刚、新中国语文教材的编者叶圣陶，均是在史学、文学领域深耕多年的学术大家。只有对学科有扎实的研究积累、洞悉学科的研究成果，编写人员才能游刃有余地将该学科的相关知识转化为教育内容。但仅有基于学科的学术研究依然不够，教材毕竟不是学术著作，优秀的学者未必是优秀的教材编写者。教材服务于一线课堂教学，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编写人员需要对教育有所研究，对儿童心理特征、课堂教学规律、宏观教育态势等问题有深入把握。从这个角度而言，教材编写人员应兼具学科专家和教育专家双重身份。

教材编写人员的学科知识与教育素养是静态的专业储备，在实际的编写过程中，还需要面对一个个具体的难题。这些难题的解决不能依靠其他力量，只能依靠研究。面对一个难题，既要研究教育目标与内容，也要研究社会现实境况及其要求，还要研究学生的真实需要。基于研究的教材编写，才能对难题有所突破，否则就是对难题的掩盖或绕行，难以实现教材编写所要达到的教育目的。

（二）教材体现理论自觉

教材学术性的第二个标准在于教材需要体现理论自觉。教材的编写要体现编写人员的理论思考，因为教材内容的确定与组织、结构的设计和搭建等各个环节背后必然需要特定的理论指引。有人认为，教材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教材的学术性只能让位于政治性，编写人员无法加入主体性的思考。^④实际上，国家意志的体现与教材的理论自觉并不矛盾。一方面，国家要求是目标性的、总体性的，并不能细化到每个内容；另一方面，即便是国家要求，也有一个化为教育活动的问题。这些教育方面的专业性问题的解决，不仅要靠经验，还要靠理论指引。教材的政治性与学术性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性恰恰要通过学术层面的理论自觉来实现。

2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215.

① 普洛特.剑桥国际英语词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12.

② 霍恩比.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7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9.

③ 李伯重.论学术与学术标准[J].社会科学论坛，2005（3）：5-14.

④ 石鸥，张美静.被低估的创新：试论教科书研制的主体性特征[J].课程·教材·教法，2019（11）：59-66.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理论自觉是编写人员的一种“先见”。但这种加入了个体性思考的“先见”，恰恰是教材质量的保证，更是教材能够不断推陈出新，进而推动教育实践进步的动力。作为“先见”的理论自觉是编写人员的主体责任和历史使命的体现。也许仅仅按照课程标准的要求以及编写人员的经验和直觉也能编出“四平八稳”的教材，但如果编写人员放弃理论思考，就只能产生缺乏教育高度和学术深度的平庸之作。^①

（三）教材对学术问题有所突破

教材学术性的第三个标准在于教材本身要对本学科所涉及的教育学术问题有所突破。教材的编写涉及诸多研究领域的问题，作为研究者的编写人员必须探究相关领域，对所涉及的教育学术问题作出探索性回应。同时，教材的编写涉及众多学科，编写过程中将多学科知识放到同一背景下考察，尤其是放在教育的要求下去权衡，可以促进学科间的对话与整合，为新知识的生成创造条件。教材直接指向教学实践，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教材的编写少不了有一线教师参与的行动研究，他们可以从实践的角度促进对既有理论的反思，这种实践的检视也能生成新认识。教材编写中所积累的策略和经验，也可以直接上升为学术理论，为相关学科的发展添砖加瓦。教材在编写中应对、解决各种问题的过程，往往就是生成新知识、建构新理论的过程。虽然教材的目的不是学术创新，但就结果而言，一套高质量的、有学术高度的教材，往往会在理论上对所涉及的学术问题有所突破和创新，能够间接地为学术发展作出贡献。

二、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学术性

依照上述标准，可以对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学术性进行审视和分析。

（一）以研究作为教材编写的基本方式

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的编写工作由在德育领域深耕多年、有丰富学术成就的专家学者领衔。即便如此，编写组在接下教材编写的任务后，依然以虔诚的态度重新开展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工作。

第一，理论研究。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在编写过程中进行了深入的基础理论研究。编写工作启动后，编写组先后召开了十余次会议，对中央文件和课程标准进行了学习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教材的价值观、道德观、德育观、文化观、历史观和功能观。^②在确定文本主题后，编写组还对相关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把握相关主题的学术研究现状，为课文设计奠定理论基础。例如，在编写六年级下册第一课“学会尊重”时，教材编写人员对“尊严”这一主题进行了理论探究，区分了“普遍性尊严”和“获得性尊严”

^① 高德胜，章乐，唐燕.“接上童气”：小学《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

^② 高德胜，章乐，唐燕.“接上童气”：小学《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254.

两个概念。^①课文中提倡的“人人都应得到尊重”的思想^②，正是来自“普遍性尊严”理论；又如，四年级上册“信息万花筒”单元，涉及电视、网络和广告等议题^③，也是基于编写人员对“媒介素养教育”等主题的深入研究。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的文本虽然浅显易懂，背后的理论支撑却极为扎实严谨。

第二，现状调研。教材编写的研究不仅要有理论打底，还要面向当下的教育现实。教材的实践性特征决定了教材编写所进行的研究不能完全是书斋式的。除了理论研究的铺垫，编写组还深度融入小学课堂，零距离参与小学的德育实践，在课堂中寻找真实的教育问题。主编鲁洁在古稀之年带领编写组与一线教师一起备课、一起解决教学问题，足迹遍布无锡、镇江、扬州、江宁等地的小学，与一线教师合作开展了大量的行动研究。^④鲁洁常说的“问问学生”，是编写组的基本工作理念。为了了解儿童在特定教育主题上的既有基础、困惑与需要，使教材真正实现回归儿童的生活，编写组通过问卷、座谈等方式，与儿童、教师交流对话，力求搞清楚儿童发展的真实情况。“每一册教材主题的确定，每一单元话题的寻找，每一课的学习内容的确定都来自与儿童的深入对话。”^⑤正因在编写中汇聚了众多儿童的心声，编写组才真正做到了“把儿童放进”教材中。

第三，试教检验。为了保证教材在实践中的可行性，教材的编写不仅立足对德育现实的调研，也经过了实践的反复检验。在课文编写基本完成后，编写组还将课文初稿交给不同地区的小学教师和学生进行试教试学，编写组成员现场听课，以此来检视教材中存在的问题。随后，教材编写人员会随机选择5—8名上课的学生，就教材中的各部分内容进行座谈，听取学生对教材的评价和意见，让课文经历儿童的“审查”。^⑥只有得到儿童认可、受儿童欢迎的课文才能“过关”。教材编写人员还与执教教师展开研讨，听取他们对课文各个部分的评价，就课文设计与教师深入交换意见，讨论修改思路。课文的试教十分注重样本选择的全面性和代表性，比如，编写组特意将交通发展等城市意味较浓的课文放在农村小学试讲，以观察农村儿童的反应。这种定稿前的试教检验，使教材文本凝聚了一线教师和学生的智慧。课堂的试教观察、师生的研讨和对话，为教材注入了鲜活的实践气息。编写人员不仅可以直接根据反馈对课文进行修改和打磨，还可以跳出“当局者迷”的困境，发现原来看不到问题，收获新启发、打开新思路。^⑦

（二）有学术理论指导的教材

^① 高德胜. 时代精神与道德教育[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197-220.

^② 鲁洁. 义务教育教科书·道德与法治（六年级下册）[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

^③ 鲁洁. 义务教育教科书·道德与法治（四年级上册）[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50-71.

^④ 高德胜，章乐，唐燕.“接上童气”：小学《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研究[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281

^⑤ 高德胜，章乐，唐燕.“接上童气”：小学《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研究[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248

^⑥ 高德胜，章乐，唐燕.“接上童气”：小学《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研究[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253

^⑦ 高德胜，章乐，唐燕.“接上童气”：小学《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研究[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255 - 259，278

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的主编鲁洁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德育学科重建的奠基人，她所领导的教材编写团队在德育领域深耕多年。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体现国家意志的前提下，教材编写人员展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将教材编写视为学术工作，以学术的方式体现立德树人的总体要求。

第一，伦理观。德育课程和教材必有相应的伦理学基础。本套德育教材重视叙事伦理学的功能，采取了理性伦理学和叙事伦理学相结合的“混合伦理学”思路，革新了教材的伦理基础。一方面，教材要体现国家意志，有体系化的要求；另一方面，教材须坚持对儿童生活的关注，又有叙事需要。教材只能在这种张力中寻找理性伦理学和叙事伦理学的融合与平衡。在微观要素上，教材的每课、每个环节的设计都以鲜活生动的生活叙事作为基本材料，但每个要素之间都有清晰的逻辑主线联系，整套教材在宏观上又具备清晰严密的体系结构，呈现出理性伦理学的特征。通过这种“混合”设计，扬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

基于对叙事伦理学教育功能的重新确认，教材采取以“生活事件”作为基本素材的组织策略。“生活事件”，即一定时间内发生的事情，包括主体活动及其言行。教材精心选取典型的、与儿童生活高度相关且有教育意义的生活事件，用这些生活事件陪伴儿童、与儿童对话。即便是儿童生活之外的事件，其中的情感与思考也可与儿童当下的经验相联结，引导他们超越当下的生活，步入更广阔的文化世界。此外，教材还对“生活事件”的形式、序列、类型和功能都作了教学化处理，使其适应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活动的开展。

①

第二，德育观。本套教材秉持“回归儿童生活”的德育理念。生活是道德的根基，也是道德存在的基本形态，道德是生活的目的系统。^②道德教育不是知识传授或智力训练，不能从抽象的概念、推理能力入手，必须要从儿童的生活经验出发。德育的最终旨归在于引导生活的建构，使儿童在道德学习中学会关注生活、反思生活、改变生活。^③生活是德育的出发点，也是德育的落脚点。这意味着学校德育必须以儿童的生活经验为素材，在儿童动态的生活实践中进行。

德育教材作为静态、统一的文本如何呈现动态和多样的儿童生活实践？本套教材的编写通过“模仿”儿童生活的方式，探索教材生活化的新路径。儿童生活具有“无事性”，即缺乏整理生活的思想图式，难以形成事件感。教材通过建构生活事件来培养儿童生活的思想图式。具体而言，教材通过各种各样的生活事件为儿童生活之事“定时”“定位”“定料”，激发儿童对生活的“事件感”。儿童的生活是缓慢、庸常的，充满偶然性，静态的教材文本难以反映儿童生活的全貌，而“模仿”则是对现实的一种框定。教材要在儿童的生活中选取有教育意蕴的生活行动进行“模仿”，就需要制作文本的“载体”，如某种场景、行动、

^① 高德胜，章乐，唐燕.“接上童气”：小学《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22-27

^② 鲁洁.生活·道德教育[J].教育研究，2006（10）：3-7.

^③ 鲁洁.道德教育的根本作为：引导生活的建构[J].教育研究，2010（6）：3-8.

言行与事态。教材通过种种“载体”将儿童生活中的琐碎事件聚拢起来，从而在文本中呈现儿童生活的全貌。而对于那些不可见、不外显的儿童生活，教材则通过设计模仿儿童生活的内在性活动，以揭示儿童的内心世界，引导儿童学习如何过内在生活。^①

第三，教材观。“回归生活”的理念也要求教材观的转型。本套教材摒弃了将教材视作“知识载体”的传统观念，以儿童的“生活事件”来组织教材，将儿童的生活经验放在比知识更优先的位置。虽然教材也追求知识的准确性，但这只是底线要求，知识归根结底要为儿童的生活与道德发展服务。教材作为“对话文本”意味着教材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知识“蓝本”，而是一个俯下身子与儿童的既有经验互动的“伙伴”。

基于这种儿童立场，教材在功能上被视作滋养儿童精神成长的“文化母乳”，是帮助儿童探索更广阔的生活及文化世界的阶梯和平台。^②教材文本由帮助儿童学习的生活经验而非德目体系构成，名为教材，实为“学材”。教材精心选取净化的、正向的文化精华，而将儿童不能消化的乃至有害的文化排除在外，以保护儿童稚嫩的心灵、激发儿童的善端。教材的知识、情感和价值以融合的方式对儿童进行文化滋养，以培育儿童对民族文化的亲近感。但这种滋养并未禁锢儿童探索外在世界的冲动，反而为儿童探索外在世界奠定了基础。儿童既有的相关经验在教材创设的情境中被引出，并与教材内容相联结，最终通过教学使“教材中的儿童”和“教室中的儿童”发生对话，并在这种对话中创造出新的意义世界。

第四，教学观。教材与教学是不能分割的整体，教材文本为教学预设了新的理念和方法，引导教学从知识学习转向生活的建构。杜威认为，直接道德教学是一种“关于道德的知识”传授，只能教授“关于道德的观念”，而能够影响行为的“道德观念”只有在整体的生活中才能培育。^③杜威的质疑挑战了直接德育教学的合法性。本套教材通过接入儿童经验的方式，将直接道德教学和儿童生活融为一体，回应了杜威对专门德育课程必要性的质疑。本套教材摒弃了知识传授的教学观，将引导儿童选择和建构有道德的生活当作教学的重点，为专门德育课程的合法性找到了新的依据。

教材对教学的引领并不要求教师将教材奉为照本宣科的“蓝本”。教材的使用需要教师发挥创造性和主动性，实现教材的“班本化”。教材逻辑不等于教学逻辑，具体的儿童生活经验是特殊的、多样的，而教材的内容和逻辑具有普遍性。教学需要教师在教材逻辑的指引下去“聆听”儿童的需要和困惑，接纳儿童当下特有的经验，并根据本班特征和当下情境运用教材，带领学生超越静态的文本，走向更开放、丰富的意义世界。^④

在引导生活建构的教学中，儿童的“学”成了教学的中心，实现了互动共生的教学关系。作为“学材”，教材内容围绕学生的学习活动来设计，对教师的“教”则作了隐性处理。

^① 高德胜，章乐，唐燕.“接上童气”：小学《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59-76

^② 高德胜.“文化母乳”：基础教育教材的功能定位[J].全球教育展望，2019（4）：92-104.

^③ 高德胜.对杜威道德教育“根本问题”的再认识[J].教育研究，2020（1）：16-29.

^④ 唐燕.教学如何“接童气”：论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逻辑的生活化[J].课程·教材·教法，2020（2）：77-84.

儿童经验进入教材拉平了师生经验背景的差距,为营造平等的对话关系创设了条件。教材中的留白设计为儿童经验的多样化表达和新意义的生成留下了空间。教材中的“活动园”“交流园”等栏目要求学生必须去观察、探究和操作,教师无法唱“独角戏”。在这种新型教学中,教师不是道德的“教授者”,而是和学生同处于一个道德学习共同体之中的学习者。教学的过程是有经验的道德学习者通过课堂中的平等对话来设计、组织、辅助、引导学生过道德生活的过程。^①

(三) 教材对学术问题的突破

在这样的研究基础和理论指引下,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在一些学术难题上取得了新突破,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

其一,探索出了儿童经验进教材的路径。专门的德育课程和教材跟儿童生活经验的落差一直是我国课程改革中的一个难关。杜威等人对专门德育课程的否定,是我国德育研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21世纪的德育课程改革,一直是在与杜威的论断辩驳中艰难前行。^②“回归儿童生活”的理念为德育走出这一困境指明了方向。秉持这一理念,本套教材通过对儿童经验的吸纳,为解决德育教材与儿童生活相分离的问题探索出了一条新道路。

本套教材的编写人员在对儿童经验的唤醒、表达和与他人经验的接续等方面进行了具体探索。儿童带入课堂的经验是无意识的“自在经验”,不是可以对象化的“一个经验”,它无法直接发挥显在的作用。教材中的“生活事件”本身是一个完整的事态,可以用它将儿童的“自在经验”转化为有头有尾的“一个经验”。教材通过“生活事件”唤醒儿童绵绵不绝的、自在形态的“经验流”,使“自在经验”进入“自觉”层面,变为成串的“一个经验”。经验与表达密不可分,为了激活经验的表达,教材在呈现表达范例后设置了提问,且每页都留出了让学生填充自身经验的空白。教材在表达方式上力求多样化,激发儿童通过口头语言、书面语言、画图、动作等多种方式将复杂情境中的经验表达出来。同时,教材也设置了评价他人经验的环节,以增进学生经验的联结。在表达中,个人经验转化为人际经验,加深了儿童对自我和他人经验的理解和共享,为儿童的社会化奠定了基础。教材还通过“活动园”等栏目,使儿童以“亲身做”的方式将经验上升为“体验”。“交流园”等栏目则促进了儿童个体经验与他人经验的交流互动,使个人经验借此与社会文化价值相联结。教材以这样的方式汇入儿童经验、“入伙”儿童,进而使儿童能够接受教材中的价值体系,为教材接上了“童气”。^③

其二,厘清了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的关系。本套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由原来的《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改名而来,并新设了法治专册。如此处理,凸显了国家对法律教育的重视,也对德育课程与教材提出了新挑战。在坚持新课改综合性的大方向下,教

^① 唐燕.为什么从事德育:论小学道德与法治课教师的道义动机及其建构[J].中国教育学刊,2020(6):8-12.

^② 高德胜.对杜威道德教育“根本问题”的再认识[J].教育研究,2020(1):16-29.

^③ 高德胜.“接童气”与儿童经验的生长:论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对儿童经验的处理[J].课程·教材·教法,2018(8):11-20.

材编写人员既要考虑道德和法律固有的深层联系，又要兼顾二者的独立性。如何处理好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的关系，成了教材不能回避的问题。本套教材探索了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融合的方式，并划定了融合的程度，为处理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依据。

首先，在儿童的“生活事件”中实现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的融合。道德与法律在儿童生活中同时存在，它们都对接儿童的生活需求，是帮助儿童实现美好生活的两个方面。比如，三年级上册第六课呈现的失学儿童的情境，既激发了学生的教育权利意识，也在道德层面唤醒了学生的同情心。其次，教材既展现道德对法律的价值支撑，也重视法律对道德的改良作用。例如，教材通过呈现法律对弱者的保护，凸显法律背后的道德温情。但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的融合是有限度的。对于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中不能融合的主题不能作机械整合。比如，“助人”“宽容”“节约粮食”等道德要求就上升不到法律层面。在六年级上册法治专册关于国家机构等法律方面的内容中也未融合道德教育。即便是在那些可以融合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的课文中，教材也明确区分了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的层次。^①例如，在五年级下册第六课“我参与，我奉献”中，课文既涉及“友善相待”等道德教育要求，也在“活动园”栏目中展现了保护老年人、未成年人的法律规定。^②教材对二者有明确区分：道德要求是个人的自愿选择，而法律规范则是不能触犯的限制性约束。

其三，探索了在传统文化教育中体现儿童立场的方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中国少年儿童精神气质的土壤。本套教材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德育价值，传统思想、节日、习俗等内容的比重有所增加。基于“回归儿童生活”的理念，传统文化教育不能忽视儿童的先在状态，必须体现儿童立场。传统文化是过去的、抽象的、系统化的成人文化经验，不可避免地儿童当下的生活有鸿沟。如何弥合这一鸿沟、在传统文化教育中体现儿童立场，是当下德育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

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对传统文化教育如何体现儿童立场进行了有益探索。在目的上，教材将传统文化教育定位为提升儿童文化素养的教育而非知识教育。教材所选取的传统文化素材均包含了儿童生活中已有的经验元素，可以让儿童在切身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例如，在二年级下册第六课“传统游戏我会玩”中，教材通过让儿童采访“长辈玩传统游戏的经验”这样的活动来激发儿童对传统文化的向往，并让儿童在亲身体验中增强与传统文化的联结。^③在结构上，教材将体系化的知识融入儿童的生活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自身的知识与思想体系及逻辑，但在教材设计中，这种体系及逻辑只能让位于儿童的心理逻辑，只能分散性地融入儿童的具体生活事件之中。在内容选择上，教材依据儿童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采取积极为主、消极为辅的原则。一方面，努力将传统文化中的“个人修养”“家国情怀”等积极元素融入教材，使其成为涵养儿童品德的资源；另一方面，正视

^① 章乐.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的融合及其限度——兼论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中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的关系[J].课程·教材·教法,2019(4):34-41.

^② 鲁洁.义务教育教科书·道德与法治(五年级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34-36.

^③ 鲁洁.义务教育教科书·道德与法治(二年级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

传统文化的消极方面，适量展现消极内容以培养儿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反思意识。^①

三、发扬教材学术成就的挑战

即便本套教材在编写上取得了以上学术成就，但这些学术成就在教育实践中的运用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内容至上”的倾向

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推行三科教材统编，强化教材建设的统一领导，对教材的重视进一步加强。一方面，这种重视使教材获得了更多的资源支持；另一方面，更细致的管理、更严格的审查以及更多的社会监督也随之而来，这促使教材内容的规范性、科学性和准确性不断加强。

然而，这些关注往往是一种成人目光的审视，大多聚焦在教材外显的内容上，由此引发、加重了“内容至上”的倾向，容易使教材编写不自觉地忽视内在的“教育逻辑”，反倒有损教材的学术性。教材的学术性不仅要求内容的规范、准确和科学，还要考虑在教学上是否适宜、是否经得起儿童视角的审查。前者是教材的“内容律”，后者是教材的“教育律”，二者之间有巨大的张力。教材的内容逻辑具有封闭性，与儿童的心理逻辑有相排斥的一面。“教育律”要求引入儿童的生活经验，这意味着在内容上要打破原有封闭的知识体系。但是，“内容律”的错误更容易被发现，因此更受关注。“教育律”的问题则容易被忽视，只要内容正确，即便不适宜教学，往往也不是“硬伤”，很难引起重视。过多的外在审视挤占了教材应有的儿童视角，造成“内容至上”的倾向，即将学生的学习动机、兴趣挡在外面，虽然教材内容表面上精准无误，但在教学上并不适宜。教材的学术性要求将“教育律”放在第一位，只有内容服务于教育，才能实现二者的统一。社会的重视本是好事，但若教材编写一味迎合外在目光，追求“内容至上”，反倒降低了教材的教育标准。如何屏蔽外在目光的干扰与诱导，为教材编写营造一个相对独立的专业空间，以捍卫教材固有的教育逻辑、保护教材的学术性，是教材编写体制建设中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二）“应试”化的教学氛围

教材的学术成就，归根结底要在实践上转化为教育成就。然而，当下功利的“应试”教育环境却不是教材的学术理念生根发芽的适宜土壤。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中预设的新理念、新方法，在“应试”大环境下往往只能止于纸面。教材的学术理念与“应试”化的教学存在本质冲突，前者要求教学回归儿童生活，服务儿童生活的建构，不刻意追求“应试”效果；后者以“应试”为唯一目的，视生活为冗余甚至干扰因素，要求将儿童封闭在备考内容的框架内进行抽象知识的灌输和“应试”技巧的机械训练。在“应试”教育的“囚徒困境”中，师生即便理解、认可教材的新理念、新方法，但迫于竞争压力，也不

^① 章乐. 儿童立场与传统文化教育——兼论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J]. 课程·教材·教法, 2018(8): 21-26.

敢轻易在教学中付诸实践。

因此，本套教材的使用在“应试”氛围中往往只能“穿新鞋，走老路”，与编写人员的学术思考和价值期待南辕北辙。“应试”教育必然是脱离儿童生活的异己存在，因为知识只有从儿童纷繁的生活经验中抽离出来才最具有“应试”效率。如果教学内容已被考试范围预先设定，课堂就失去了让学生创生新意义、建构新生活的空间。“应试”教育表面将教材文本奉为圭臬，但因对儿童生活的排斥，实则早已抛弃了教材“回归生活”的理念。“应试”化的教学不仅背离了教材的学术追求，也让德育沦为无效的“知识德育”。“接童气”的教材若仍被当作“应试”材料，编写人员推进教材学术化的努力在教育实践上就会走向“归零”的宿命。

（三）对“副科”的轻视

教材的学术性服务于教学实践，也扎根于教学实践。只有经受教学实践的反复检验，教材的学术性才能得以生长和发展。课程标准对中小学课程设置已有具体安排，但是受传统观念和“应试”倾向影响，学科课程被人为地划分为“主科”和“副科”，德育课就属于“副科”之列。社会各界“德育为先”的呼吁，改变不了作为“副科”的德育课被边缘化的现实。目前，许多地区，德育课整体上以兼职教师为主，专任教师极度缺乏。学校在德育教师安排上，优先考虑的不是教师的专业能力，而是课时量的平衡搭配。德育课的师资门槛远低于“主科”，甚至沦为凑齐教师工作量的“百搭课”。^①另外，德育课课时被“主科”挪用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连基本的课时也难以保证。“副科”的现状还打压了德育教师的教学积极性。由于在学校绩效考核和职称评审上往往向“主科”倾斜，德育课对教师晋升作用不大，甚至被视作“本职”外的累赘。

“副科”的尴尬地位限制了德育教材的实践条件。德育教材虽然是以儿童学习为核心建构的，但毕竟不是课外读物，道德学习须在教师精心组织的课堂上才能实际发生，不能靠学生自学。教材为教师的“助学”设计好了思路，也对教师的教学投入、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认真研磨教材，并深入了解本班学情，实现教材的“班本化”，只有这样教材的学术构想才能实现。但在“副科”的影响下，教师能力不够、敷衍了事以及课时不足等问题司空见惯，教材中的学术思考难以在实践中落地生根。一旦教材的理念在教学实践中被架空，教材中已有的学术探索得不到印证，教材发展的“反思—实践”循环就会被打破，教材的学术性也将失去根基。

教材编写是教育改革的一部分，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学术成就是我国课程改革新进展的一种体现，不仅为后续教材编写积累了学术经验，也为德育课程的转型贡献了力量。但教材编写是没有终点的事业，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有赖于现实教育生态的优化。要想使教材的学术性得以持续生长和弘扬，并转化为教育实践的进步，单靠教材编写是不够的，更需要教育实践者、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① 程骏，季文华，盛宏宝.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队伍建设的问题与建议——以安徽省部分县区为例[J]. 中国德育，2019（16）：26-30.

参考文献:

- [1] 严复. 论小学教科书亟宜审定[J]. 东方杂志, 1906 (6): 105-109.
- [2] 石鸥. 教科书概论[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9: 104.
- [3]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 (第 7 版) [DB/OL]. (2021-05-17) [2023-01-14]. <https://www.cihai.com.cn/yucaidetail?docLibId=1107&docId=5742142&q=>
- [4] 李伯重. 论学术与学术标准[J]. 社会科学论坛, 2005 (3): 5-14.
- [5] 石鸥, 张美静. 被低估的创新: 试论教科书研制的主体性特征[J]. 课程·教材·教法, 2019 (11): 59-66.
- [6] 高德胜, 章乐, 唐燕. “接上童气”: 小学《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研究[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
- [7] 高德胜. 时代精神与道德教育[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 197-220.
- [8] 鲁洁. 义务教育教科书·道德与法治 (六年级下册)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
- [9] 鲁洁. 义务教育教科书·道德与法治 (四年级上册)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 50-71.
- [10] 鲁洁. 生活·道德教育[J]. 教育研究, 2006 (10): 3-7.
- [11] 鲁洁. 道德教育的根本作为: 引导生活的建构[J]. 教育研究, 2010 (6): 3-8.
- [12] 高德胜. “文化母乳”: 基础教育教材的功能定位[J]. 全球教育展望, 2019 (4): 92-104.
- [13] 高德胜. 对杜威道德教育“根本问题”的再认识[J]. 教育研究, 2020 (1): 16-29.
- [14] 唐燕. 教学如何“接童气”: 论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逻辑的生活化[J]. 课程·教材·教法, 2020 (2): 77-84.
- [15] 唐燕. 为什么从事德育: 论小学道德与法治课教师的道义动机及其建构[J]. 中国教育学刊, 2020 (6): 8-12.
- [16] 高德胜. “接童气”与儿童经验的生长: 论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对儿童经验的处理[J]. 课程·教材·教法, 2018 (8): 11-20.
- [17] 章乐. 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的融合及其限度——兼论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中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的关系[J]. 课程·教材·教法, 2019 (4): 34-41.
- [18] 鲁洁. 义务教育教科书·道德与法治 (五年级下册)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 34-36.
- [19] 鲁洁. 义务教育教科书·道德与法治 (二年级下册)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

[20] 章乐. 儿童立场与传统文化教育——兼论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J]. 课程·教材·教法, 2018 (8): 21-26.

[21] 程骏, 季文华, 盛宏宝.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队伍建设的问题与建议——以安徽省部分县区为例[J]. 中国德育, 2019 (16): 26-30.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Unified Elementary School Textbook *Morality and Law*

Wu Songwei, Gao Desheng

Abstract: The success of unified elementary school textbook *Morality and Law* is based on its academic background. Textbook academic standards consist of research as basis,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and breakthroughs in academic issues. The complication of this set of textbooks is based on research and guided by academic theories in ethics, moral education, textbooks, and instruction. It makes a lot of breakthroughs in academic issues, such as finding the path of integrating children's experience into textbook,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education and legal education, and figuring out the ways to illustrate children's posi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education. The inclination of "content first", examination-oriented teaching, and the ignorance for "sub-subjects" are the main challenges to develop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textbook. Therefore, joint efforts are required to carry forward textbooks' academic nature and turn academic achievement into progress.

Keywords: elementary school; *Morality and law*; unified textbook of morality of morality and law, Chinese and history; moral education

转引自《课程·教材·教法》2024年第2期